绪　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尽管这一观点已经提出一百多年了，也不时地遭到英雄主义史观的攻击，但时间和攻击都无法抹去它的正确性，今天，它仍是我们认识历史问题的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在浩繁的历史卷恢中，彰显的是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我们很难寻觅到群众的身影，所谓历史，似乎成了帝王的家谱。然而"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人民群众尽管不是决定历史的显层力量，但却是决定历史的最终力量，是他们主宰着历史的命运。而且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社会危机和王朝更迭的时候，民众是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王朝的主力军，尽管这时他们仍站在领袖人物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背后，但他们的力量足以使每一位领袖人物为之震撼和敬畏。在这个时候,违背民意者亡国灭身,顺应民意者立国为王。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些明君贤臣们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相应提出重民保民乃至民本思想。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兴邦的根本的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民本思想源于传说时代,萌芽于西周之初,成熟于战国之末。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尧茅茨不剪而居、舜躬耕畎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故事，都反映了原始部落首领关爱民生、与民同苦乐的良好品质,这些品质尽管有后世思想家附丽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原始时代的君主风范。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人们不得不平等互助 由于战胜困难的需要,氏族首领不得不‘ 身执耒臿,以民为先 ”。原始时代部落首领的民主作风对阶级社会君民关系的正确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一位意欲成为君主的人，或每一位期望自己的统治能长久的人，都不敢忽视民众的存在。由于重民保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所以即使在夏商时代,尽管统治者极力强化统治机构,极力用神的光芒来保佑自己，但也不能忽视对于民生的关注和重视。

当然,原始时代的民主作风,夏商时期的重民保民信息,还属于非常原生的和质朴的政治意识，还不能作为自觉的政治思想看待，把重民保民意识升华为一种思想，是西周初年的事情。商周政权的转移是民本思想诞生的催化剂。“ 大邑商 ”的骤然溃败和“ 小邦周 ”的顺利登庸使君民固有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周初统治集团在巨大震惊之余，小心翼翼地分析和总结双方胜败原因，历史使他们很快明白了重民保民是维持周王朝生存下

去的根本之一，“敬天保民”思想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周初的保民思想在民本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周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民——君的对立统一关系，现实政治开始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定位，于是以往重民保民的意识开始向一种自觉的思想转化，民本思想也开始形成。出于对民众力量的严重惊惧，重民保民思想在西周统治者的强力推动下深入到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以至于西周中后期出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理论，甚至有国人暴动和“流王”之举。这些是民本思想在西周不断发展的表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和人性的空前解放，使民本思想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本思想在这一阶段最终摆脱了神的枷锁，成为世俗政治的重要部分。在有关春秋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极为经典的观点令人为之振奋，诸如“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等等。春秋末期，孔子对这些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发挥，建立了他的一整套民本思想理论。进入战国，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加剧，社会变革和重建进入了快车道。为建立新的政治架构和新的政治伦理，无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和大胆的实践尝试。由于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日显重要，民本思想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为什么要以民为本、实现民本的途径以及民本思想的理论建设等方面，思想家们和开明的政治家们都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在不断的争鸣与总结中，民本思想结成了丰富完善

的理论形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战国中期把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研究推到了顶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等主张,尽管已经远离现实政治的需求，但却大大促进了民本思想在理论上的完善和升华。到战国末期,鉴于封建集权政治已经稳固,荀子对民本思想进行了彻底的加工改造，使这种思想在理论上完成了与封建政治的接轨。

民本思想从西周初期萌芽到战国末期完成理论上的改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单元。研究这样一个单元，对于我们弄清民本思想生发时期的情况，乃至整个传统时代民本思想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今天，史学界已经普遍接受把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元文化”时期的说法,但要谈及政治文明的“元典时期”,恐怕可靠的说法还需要上溯到西周。西周的礼乐文化显然是周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思维的基本素材，西周文明和周秦诸子是分不开的。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无论从制度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意识文化的角度看，其主体内容形成于两周应该是一种较为妥当的认识。透析两周文化,是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甚至是认知整个封建时代乃至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基础。

鉴往知来。研究历史的作用不仅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要给今天的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明,如何将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尽管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思想有巨大的差异，但其以民为本的基

本要素在相当程度上是相通的，我们从中可以直接获得不少有益的借鉴。

民本思想是我国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份历久弥贵的遗产。“民惟邦本”、“民者，国之基也”等观念，尽管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但其警示和借鉴作用一点也没有减低。从政治的角度讲，以民为本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重要主题，抛弃这一主题，就等于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相反，坚持这一主题，是走向昌盛的基础，这已经为数千年的中国及世界历史所证明。而研究传统政治文明原生时代民本思想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其历史内涵和影响，对于今天民主体制的建设，肯定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正是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早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开始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广泛关注，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鲁迅、梁漱溟、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冯友兰等，都曾著书立说，探讨民本思想与传统政治之间的关系，并期望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寻找到一条可以通达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是深入和广泛的，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斗士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和否定上，新儒家的代表们则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回护和继承上，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民本思想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之中，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相继有一些论著问世。其间，学术界出版的各种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断代史和论文等从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同的角度、层面对民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然而有关论著并不十分丰富，根据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在国家和地方图书馆中,相关著作有两部,论文数十篇。这两部著作是 游唤民先生的《先秦民本思想》,1991 年 8 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 1999 年山东省政协组织一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家，为基层领导干部编撰的《民惟邦本丛书》,2000 年 1 月由齐鲁书社出版。游氏的《先秦民本思想》一书,可称得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本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资料搜集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作者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主线，介绍了民本思想在各个阶段的表现，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抹。而《民惟邦本丛书》集实用性、通俗性于一体,从先秦到当代,对民本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展现,这份工作,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民本思想的发展轨迹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以上这些研究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游唤民先生的《先秦民本思想》明显存在四点缺陷：（一）缺乏对民本思想发展的原因和内部机理的探讨。书中首先介绍了民本思想的一般概念和内涵，随之介绍了民本思想在各时段的状况，而各时段之间民本思想是怎样演变及演变的原因怎样,书中缺乏探讨。(二)作者也试图勾勒民本思想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发展的轨迹，但由于对民本思想认识的固化和就事论事叙事方式的束缚,往往稍尝即止,以至于使人们很难抓住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三）在史料的使用上有罗列堆砌之感。(四)该书形成于十年之前,有些观点已经过时。《民惟邦本丛

书》是一部基层干部普及读物，其研究深度可想而知。该书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尽管书中也偶有精辟的见解,但基本上不能作为学术著作看待。当然,我们以学术著作要求本书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有悖于作者的初衷和该书的意旨。至于单篇论文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各执一辞,谈不上融会贯通,在这里姑且不论。

人类某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借助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是前人的思想成就。民本思想的产生和进步也离不开这两个前提。因此,重视这两个前提的研究,是弄清民本思想来龙去脉的基础。社会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民众地位的改变和提高；民众地位的变化又引导着民本思想行进的历程。在本书中，我们将十分关注民众地位在各时期的变化及其影响，并由此追寻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民本思想对于社会的反作用,探究这一思想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

对于民本思想内涵的研究是本书的重点。民本思想在两周时期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近千年的演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这一过程是复杂的,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将紧扣民本思想递进的脉搏,力争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来。

民本思想不是虚无的臆想,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我们将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两周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其源,辨其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在材料的使用上，除传统的文献外，视野将进一步扩展到金文、

帛书及简牍。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作者会抱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借鉴和吸纳。至于是否能达到自己所设计的目标并有所创新,有待于大家评判。

第一章　两周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人类思想发展史更是如此。在社会不发达的年代，先辈们的经验对社会的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社会越是不发达，经验的意义就越是重要，其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越长。正因为如此，原始社会的遗风长久地影响着早期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风范，正是孕育早期阶级社会重民保民思想的重要基础。

尽管尧、舜等远古酋长们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丝毫也没有减弱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在夏商周三代圣王的身上我们经常可以觅到他们的遗风。《吕氏春秋·自知》中这样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不仅如此，来自远古酋长们的传说也成了周秦诸子民本思想的重要素材。儒家虽醉心于"文武之道"，但他们"言必尧舜"，对传说时代的民主赞美有加，并时常把尧舜时代的民主作为论证自己民本学说的依据；墨家也是言必尧舜，尧舜时代的民主甚至成了他们平等思想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考察民本思想的渊源时，不能不追溯到远古时代。

第一节　原始文明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原始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异常险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禽兽虫害时时刻刻威胁着原始人的生存。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甚至成了‘不胜禽兽’的弱势群体。在先秦的一些文献里有不少这方面的描述，如《韩非子·五蠹》篇中写道：

>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庄子·盗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礼记·礼运》篇也这样写道：

>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这就是早期原始人的生活，一种简单到类似动物的生活。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食物极度匮乏,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必须参加劳动。在生存十分困难的时刻,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什么特权,大家只能也必须结成平等的、互助的关系,才能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多的机会。

在共同抵御灾害和获取生存必需品的过程中,以‘群’的方式集体出动是最有成效的生存方式，先民们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吕氏春秋·恃君览》里这样写道：

>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而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群’的作用,推举一个首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这个首领的任职条件是他（或她）必须能够给这个“群”——后来是氏族——带来生存条件切实的改善。如有巢氏能教人筑巢，燧人氏能教人取火等。由于推举条件体现了“群众”的需要,过程由‘群众’操作掌握,首领又必须为‘群众”负责,因此这样的推举便具有了民主的特征,这样的社会,也就成了所谓的原始‘民主社会”。

在周秦诸子那里，对于这种民主的生活有许多形象而生动的描述,如《吕氏春秋·恃君览》写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在这个无君无臣的社会里，一切后来社会离不开的约束，都显得多余，所以《庄子·盗跖》称之为"至德之世"：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生活尽管是艰辛的，但那份安逸和自由是多么令人神往！部落酋长与其说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倒不如说是大家的"衣食父母"。《白虎通》卷一里就这样写道：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

《淮南子·修务篇》几乎同出一词：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蚌)之肉，时多

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㬎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君主民选，被选上后还要和普通人一样劳作，有时甚至还得冒生命危险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的社会对芸芸众生来说是令人神往的，而在诸子的笔端自然是最理想的社会。所以《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的称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原始民主时代的确是搜索重民保民思想历史依据的重要区间。这里有丰富的“人道”和“民主”内容，而这种“人道”和“民主”，显然能给重民保民思想的阐发提供极大的支持。在这个时代，氏族首领拥有的更多的是他（或她）为大众服务的义务，而不是他(或她)支配别人的权力。与其说是一位首领，倒不如说是一位“公仆”。这种在原始社会前中期普遍存在的情况会演化成一种习惯原则，影响原始社会后期的每位氏族首领。

上面我们提到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神农，下面我们再看一看传说最多的黄帝、尧、舜、禹，《周易·系辞》里写道：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由于尧生前勤于民事，受到了广大氏族成员的衷心爱戴，以至于他死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而舜年轻时就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史记·五帝本纪》中追记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特他继承"君"位后，更是一个忙得无法分身的人。要祭祀，要巡狩，要处理政务，还要孝敬父母等等；最后竟死在巡狩途中。他和尧同样关心民生，他对弃说："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对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①至于大禹的事迹家喻户晓，这又是一个舍身为民的人。《庄子·天下》篇中这样记述这位帝王：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再看看《吕氏春秋·古乐》中的描述：

①《尚书·尧典》。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潦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

这样一个帝王,致使孔子挑不出一点毛病来,在《论语 ·泰伯》中记下了孔子的感叹：

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关于这些氏族首领的生活,《韩非子 · 五蠹》中有过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文献中对远古帝王的这些描写，有后来思想家们的溢美之词,但在那个年代,恐怕这些帝王的确不得不什么事都要做。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食物的缺乏,每一位氏族成员包括氏族首领都必须参加劳动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食物会相对丰富一些,甚至有部分剩余，这使得氏族中的少数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了可能，但原始的民主风尚并没有因财物的增多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风尚依旧会要求氏族的首领们承担他们能看得见的

许多任务。或许这就是一种规定，每一位氏族首领都必须遵守。而这种规定随后又演变成一种惯例或原则，这种惯例又世代相传，所以留下了许多远古帝王辛勤为民的事迹。

不管是惯例也好,原则也罢,原始时代部落酋长们向后世君主传达的为政的基本精神是明确的,那就是重民。在《皋陶谟》中对这种精神说得很清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这些部落酋长们的人道风范也会给后世大众留下一种有关君主形象的固定概念或惯性思维，它不仅会促使人们形成一种崇祖现象，同时还会在意识上制约后世君主的行为方式。"我们的先祖就是这样做的"——民众会如是说。即使后世的君主们不愿意去学着做，但他们也不能不忌惮这种声音的存在，从而在政治活动中添加上民本的色彩。

传说帝王们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更表现在制度上。由他们所创制的禅让制度固化和加强了重民思想的传扬，并使它更有可能对日后的政治生活发挥影响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尧舜禅让的故事：

>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

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继任氏族部落的首领，历经了一个严格的推选过程，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体现,而舜之所以能当选,原因是他有‘德”,是他能为民办事。禹的继任过程和舜几乎一样，《史记·夏本纪》这样记载：

>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

随后，禹也像舜一样经过一番考察训练，最终被推举为氏族首领。

禅让制度是原始民主在制度层面的反映，是原始民主的延续。而它确立的意义不免使人们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首领的产生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或者说，当选首领必须为民众办事，才是一个合格的首领。禅让制度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必将对阶级社会产生影响。一方面，由它而产生的民主意识已经深深铭刻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中,社会在变化,但是来自原始社会的美好回忆,将历久弥深,并将层累于人们的记忆中,在适当的时候迸发,影响阶级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意欲成为阶级社会君主的每一个人,或者阶级社会的每一位君主,都将无法回避这样一段民主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影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